编辑 杨怀锁 陈培营 校对 司建伟
电话 67655277 Email:cpypy@163.com

反腐败，决心和勇气不可或缺

反腐败是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何取得新成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这进一步宣示了我们党与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的鲜明立场，进一步彰显了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在反腐败中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始终以坚定决心和巨大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取得人民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同样需要决心和勇气。去年，我国反腐败工作创造了不少“最多”和“最高”：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31人，是近些年中央纪委查办案件最多的一年；全国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18万人，是近些年处分党员干部人数最多的一年；10个中央巡视组分两轮对20个地方、部门和单位开展巡视，其中第一轮巡视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线索比过去增加5倍，是近些年巡视工作效果和质量最高的一年；等等。这些“最多”和“最高”，体现了中央在反腐败问题上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和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受到了干部群众的普遍好评。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同时也是各种矛盾凸显期。在这一时期，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既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也容易毁掉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如果没有施猛药的决心，不以暴风雷霆之势打击腐败，就不足以遏制腐败；如果没有用重典的决心，不以严厉的手段惩治腐败，就不足以震慑腐败。法国大文豪雨果说过：“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孙子云：“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历史和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就一定能找到反腐败的良策；只要我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提高对腐败的进攻力和杀伤率，就一定能打好反腐败这场歼灭战和持久战。

腐败是滋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与蛆痈，如果没有“向自己动手术刀”的勇气，就会遗毒无穷、养痈成患，对党造成致命伤害；如果对腐败分子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党和人民就绝不会答应。我们必须拿出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管是谁，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触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就一查到底，决不手软、决不姑息；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抓早抓小，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让人民群众看到铲除腐败的希望。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不管做任何事情，只要下定决心、鼓足勇气去做，加之方法对头，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新形势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是如此。 孙志勇

向贫困宣战 倚赖更加科学的制度

“向贫困宣战”“创新扶贫开发方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3月12日《人民日报》)

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存在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这就容易造成扶贫专项资金的滥用和浪费，也是屡屡导致贫困县修建“豪华衙门”、即使脱贫也不愿摘掉“贫困帽”等社会怪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了解，目前农村贫困人口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7.4万户住户调查得出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出来的，对于研究贫困人口规模、分析贫困发展趋势比较科学，但具体扶贫工作中还要弄清楚“谁是贫困人口”“致贫原因何在”“如何针对性帮扶”等问题。

如果一项政策是针对特殊对象或特定群体而制定的，那么对特殊对象或特定群体的筛选、甄别工作就很重要，否则政策效应很难显现。扶贫工作恰恰就是这样。近年来，关于一些贫困县频频冒出与之身份不符的做法让人匪夷所思，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究其原因，无外乎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各种疏漏。不能准确识别贫困人口，让非贫困人口钻了空子，没有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让“假贫扮真贫”混淆了视听，减贫脱贫的目标就只能沦为“空中楼阁”。

贫困人口识别不准有碍社会政策的公平公正。目前各地确定贫困人口的实际做法，多是政府机构根据扶贫资金规模和县域统计数据，测算确定具体村庄贫困农户的数量，再由该村遴选出贫困户。业内人士分析，这种方法不能做到应扶尽扶，一些真正的贫困户没被选出来。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展了为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通过发扬基层民主，透明程序，保证了贫困户认定的相对公平公开。

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摸清贫困家底，才能让针对性帮扶有的放矢。扶贫资金精准滴灌，才能提高减贫效益。针对不同程度的贫困对象，扶贫制度设计也应有所不同。相对贫困的有普惠政策覆盖，严重贫困的有特惠政策托底，扶持力度和方式方法要体现层次上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扶到真贫，减贫也才能提高成效。

当然，输血不如造血。不少地方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突击式短期行为，重输血轻造血比较普遍。只注重资金滴灌，不注重能力培养，是无法做到彻底脱贫或稳定脱贫的。否则，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能力短缺长期处于贫困的现象将屡见不鲜。所以，扶贫制度设计要长短结合，输血和造血结合，注重培养提高贫困人口的劳动能力，改善健康状况和后代的受教育状况，才能让贫困群体离贫困越来越远，不让贫困代代相传。

扶贫开发中，防腐、反腐工作同样重要。不能让腐败分子拿着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救急钱”挥霍败坏，高度警惕贫困县中的腐败现象，大大增加腐败分子的违法、违规成本，用更加科学、严密的制度为实现扶贫目标保驾护航。 宋华

两会代表热议行政审批改革，“处长经济”“科长经济”成热点话题。有代表说，一个处长、科长就导致一个项目拖了很长时间，或者拖黄了的事，太多了。代表中一位厅级干部说：“我有时也会为一些项目请这些有行政审批权的处长们吃饭，送点土特产搞好关系，很无奈。”

“处长经济”是权力变现的怪胎

能逆转下级请上级这样的“官场潜规则”，看来“处长经济”“科长经济”确实能量不小。按照行政职级来看，科长、处长职务不算高，但很多时候谁都不敢拿他们不当干部。一方面，部门决策权虽不在处长手中，但作为决策后的具体执行者，处长的执行权不容忽视，快办还是慢办，全办还是部分办，都得看他们怎么办。另一方面，作为上传下达的关键一环，他们往往承担着文件起草、审核材料等基础工作。向上，他们的意见分量不轻；向下，又直接面对办事人。卡住了“阎王好见，小鬼难求”的关键位置，自然有摆架子、逞官威的资格。有了这两方面“特长”，“处长经济”就有了基础。曾有人称，某些部委成了“部长领导下的处长负责制”。也正因为此，处长往往成为“跑部钱进”的重点关照对象。

名义上权力不大，手中却掌握了实权，发生厅官要请处长吃饭的事情不难理解，这是应了那句老话：县官不如现管。而在处长面前竞折腰的绝不止厅官，有企业界人士就感叹：“在落后地方，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

当然，要搞死人的处长不多，但堪称搞钱能手的处长却不少，以至于与“处长经济”联系密切的“处长贪腐”，俨然成为了小官大贪的典范。许多例子告诉我们，反腐打“老虎”固然重要，但更多腐败还是发生在“苍蝇”身上，很多“老虎”也是从“苍蝇”进化而来。论职级，科长、处长确实是“苍蝇”，但掌握了关键权力，处在了关键位置，也可能出现“苍蝇猛于虎”的现象。

其实，“处长经济”并非处长自己有多大的能耐，根源还是手中把持的权力用于寻租变现，从而形成超越职级的“怪胎”。而要打破“处长经济”，遏制小官大贪，也该从规范权力运行入手。行政审批改革推进以来，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已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今年还将加码。通过改革，能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备案能行的就不必报批，集中在部委、省厅的审批权少了很多。改革的前进方向，正是要铲掉“处长经济”的生长土壤。

然而，还有很多不能下放的审批权力，还有一些工作必须由处长执行，怎么办？权力并非等于腐败，只有绝对的权力才可能滋生腐败。行政审批改革提出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只要让处长们把手中的权力拿出来晒一晒，让办事人对经办人员的办事效率评一评，必然切断处长们将权力变现的暗道。 张涨

留住乡村医生

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分布散，而较低的收入、繁重的工作，以及发展空间的受限，致使部分乡村医生难以长期坚守。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招不到合格医生，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对此，不少地方在探索政策性补助、医疗风险分担等对策，以此扶持村医个人发展，保证农村医疗“网底”不破。这正是：

漫漫焦渴乡土，
病患呻吟何苦！
切盼身边华佗，
善政良医互补。

锡 兵 文/图

“依法办事”也是一种担当

今年两会上，无论政府和“两高”的工作报告，还是代表委员的议政建言，“依法”都是反复出现的一个词。这体现了一种法治共识，也强化一项治理标准。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对领导干部来说，如何衡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除了看能不能依法办事，还要看愿不愿依法办事、敢不敢依法办事。

换句话说，一事当前，是先想到法治方式，还是法外手段？处理矛盾，是只想着息事宁人，还是捍卫法律尊严？面对压力，是只顾四处讨好，还是坚守法律底线？调整利益，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还是坚持一碗水端平？

这些问题，似乎都是底线要求，但换个角度，则体现了一种担当精神。“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在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担当”的语境中，依法办事应该成为最醒目的度量衡。

现在有种现象，一些地方遭遇负面新闻，不问青红皂白，就火速免职干部，以此平息舆论；不管是非曲直，只希望花钱买太平，赶紧捂盖子灭火；不顾合法与否，在“强者”“弱者”的概念下，主观偏袒一方。这种做法看似高效，却忽视了“法治是最大的公共利益”，也导致了法律公信力的下降。

当然，强调依法办事的担当，也要有依法平安的保障。一方面要树立导向：比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另一方面要明确后果：比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对不作为乱作为的惩戒，给敢担当敢负责的撑腰，才能打消“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的顾虑，让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更多干部身上生长。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担当。“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当更多人在领导干部依法履职中坚定法律信仰，当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普遍选择，法治中国才有希望。 范正伟

银行自我革命还需外压促进

如果说利率市场化是银行的自我革命的话，那么试点民营银行就是为之进一步施加外部压力。仅仅依靠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彻底成长为竞争主体的推动仍是有限的。

市场化因子，正在全面渗透到传统金融领域的肌理中，一个竞争性金融格局的轮廓已然浮现。昨日，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存款利率放开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就能实现。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透露，第一批5家民营银行的试点工作将会展开。

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是利率市场化必须走完的“最后一公里”。互联网金融初兴以后银行存款的规模性搬家，已经折射出银行不能成长为完整的市场主体的被动。这种对于竞争的不适应症，在近两年已经多次显现，比如阶段性“钱荒”的意外出现。如果银行处于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有生有死，那么同业拆借利率就有可能避免忽高忽低，对于货币政策的误导以及对市场的负面影响都可以大为减少。

相较于在“襁褓”中受到保护可能造成的风险，在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后利率突然上升造成的风险要小得多。在百姓对于存款利率偏低、担心资金缩水的普遍担忧的情形下，利率的阶段性上升等于给了储户补贴。这种补贴基本上是银行将利润让出了一部分，除非出现极恶性竞争且存款保险制度跟不上，否则给储户补贴不会造成系统性风险。

如果说利率市场化是银行的自我革命的话，那么试点民营银行就是为之进一步施加外部压力。仅仅依靠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彻底成长为竞争主体的推动仍是有限的。利率市场化更突出的效应，很可能表现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简单市场行为，资金雄厚网点众多的国有银行完全有可能吃掉弱小的竞争者，而国有银行之间的竞争局面则难以形成。如此，则垄断性的金融格局最多只是被利率市场化敲打出了几个缝隙，而不能真正破裂。

因此，在银行通过利率市场化进行自我革命的同时，还必须给其施加强有力的外部压力。挑选那些主营业务突出、资金实力强的民营企业发起成立民营银行，就可以起到促使银行不断向市场化前进的作用。当然，民营银行带来竞争收益的同时，也会有无法进行破产清算的问题，或将民营银行作为其主业输送资金的通道。对此，需要设立防火墙，比如共同发起人制、破产清算制度等。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只将民营银行视为现有金融格局的补充，强令民营银行只服务小微企业。民营银行应与国有、股份制银行站在同一平台竞争，市场自会主导民营银行的钱去哪里。平等的制度设计，比放开银行特种经营资格更重要。有了这一前提，金融格局才能别开生面，百姓、企业才能享受竞争之利。 徐立凡

成龙在政协小组讨论时说：“我给别人的印象感觉我在中国内地很有办法，其实我根本没办法。我有一块地在内地，各种手续都办不下来，这个部门把我推到那个部门，推来推去，快8年了，都没办完手续，我准备放弃了，不要这块地了。”

终结审批长跑 才能避免成龙7年之难

长久以来，办事难广受诟病。但因为是在“两会”场合从著名影星成龙的口中说出，因此又有一丝特别的滋味。连成龙与政府部门打交道都要经历“七年之难”，可以想象，普通老百姓平常办事又需承担多少困难。

成龙很坦诚，声称自己不想给人留下有特权的印象，因此“不走后门”。但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需要经历各种手续，各种公章的“认可”。最后只得感叹“没有办法”、“准备放弃了”。这也道出了多少办事难的无奈。

实际上，办事难的原因无外乎有如下几点：其一，部门职能重叠。一些政府机构虽然表面看“面孔”不同，但细细看来其公共服务却有重叠之处，导致老百姓办事需要几头跑；其二，职能部门爱好“踢皮球”；其三，把机构利益看得过重，舍不得放权。办事过程中，原本可以省去的一些程序和环节，愣是拽得紧紧的，非要用一个公章、一个签字、一个手续来加以“钦点”。

而成龙一块地“7年未批完”，不过是个典型案例。它折射的，无疑也是审批冗杂、流水线长的深层痼疾。而这其中，究竟有无故意作梗的现象，有无审批腐败，都需要追问。某种程度上，成龙遭遇围观，就是源于公众对其有切身体感，所以产生共鸣。

而治理之方，说来说去，还在于加快简政放权工作，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也破除各部门间存在的利益藩篱。只有程序简化了，审批腐败机会被剥离了，审批马拉松才能被终结，而成龙的“七年之难”，才不会成一个晦暗标记，标注在行政工作的肌体上。 李松林

和生命抢道是不可容忍的恶

因私家车占道导致消防车、救护车无法通行的事不胜枚举。表面看，这只是一个文明素养的问题，但正是因为这些小小的恶习，让许多人淡化了规则意识，逐渐养成了一种不计后果的利己行为，以至于出现了“堵住医院大门”的极端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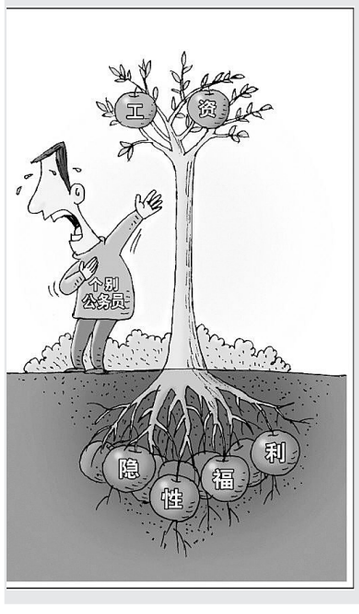
3月10日上午，安徽省黄山市烟草专卖局徽州区分局的驾驶员单某驾驶单位车辆前往黄山市人民医院时，因故和医院保安发生争执，随后单某将驾驶的车辆停在医院进出大门口，导致救护车等不能及时进入。据医生介绍，救护车上的患者于9点半左右送入急救室，手脚为严重挤压伤，最后只得截肢。

只因小小的争执，就用车辆堵住医院大门，何其霸道而无知的行为！正如医生所说：“对于这种危重患者，抢救的黄金期得精确到秒，晚一步，都会有生命危险。”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名患者被截肢与医院大门被堵有关，但驾驶员单某的行为无疑在客观上延误了救治患者的宝贵时间。当时的场景回想起来仍不免让人后怕：从医院大门到急救室仅仅50米的距离，而这短短的50米，却差点因为一个疯狂的举动而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对于这起事件，当事司机表示，驾驶单位公车到医院是“带人来看病的”，而其所在单位的一名负责人却表示，“当天他是帮公司采购办公桌，顺路去看看牙齿”，并认为谈论是否公车私用过于上纲上线了。自相矛盾的说法事实上已经道出了部分真相，而轻描淡写的态度，更是暴露出一些部门和公职人员对于公共伦理和职责操守的漠视。自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对浪费条例”出台以来，各级各地的政府部门都在大力压缩三公经费，在这样的语境下，质疑公车私用何以成了上纲上线？或许这只能说明，治理“三公”的力度和严密性还不够，还需要一条任何人都不敢触碰的“高压线”。

公车私用的问题需要深究，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这起事件中，规则意识的缺失，以及缺乏对常识的敬畏同样值得关注。尊重生命是最起码的人性底线。也正因为如此，救护车、消防车和校车，都是名副其实的“特权车”，享有优先通行权。同样道理，医院作为救死扶伤之地，医院大门的通道也是无可争议的“生命通道”，理应随时保持畅通无阻，任何人都无权占用。堵住医院的大门，相当于与生命抢道，本质上与间接杀人何异？这其实是一个人人都该明白的常识性问题，但在现实中，此类违背常识的事件却屡屡上演。

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寻常之恶”，虽然表现为个人行为，但其实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社会性。缺乏规则意识，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也可能是加害者。 吴龙贵



公务员“哭穷”为何被“吐槽”

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和反“四风”的开展，让社会风气焕然一新。随之而来是部分公务员“叫苦不迭”，认为自己工资太低，晒起了工资条。然而，同情声甚少，“吐槽”颇多。这种现象也成为2014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据我所知，公务员的工资真心不高，但津补贴不少，因此收入也不能算低。”全国政协委员何伟说，“当然，我说的是光明正大的合法收入，不包括那些‘隐性福利’。”

朱慧卿 文/图